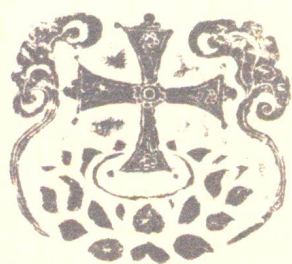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

路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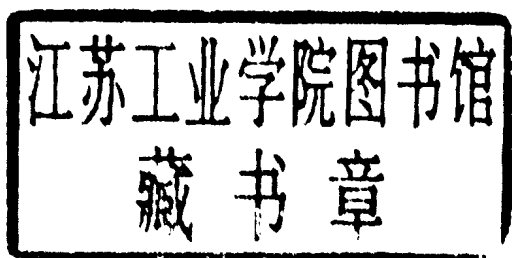
此景教碑頌并序
二氣暗空易而天也開日月運晝夜作匠成
景教碑頌并序
三百六十

与



景教与《景教碑》

路 远 著



④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景教与《景教碑》/路远著. —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712-507-5

I. 景… II. 路… III. ①景教—研究—中国—唐代
②碑铭学—中国 IV. B979.2 K87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1212 号

景教与《景教碑》

著 者: 路远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85234426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西安市镐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1—3500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2-507-5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景教碑》的发现	(11)
一、《景教碑》出土的经过	(12)
二、当时人关于《景教碑》出土的记载	(16)
1. 当时国内人士的记载	(17)
2. 当时在华耶稣会士的记载	(22)
三、关于《景教碑》出土时间、地点的争论	(27)
1. “长安说”与“盩厔说”	(27)
2. 关于盩厔大秦寺	(34)
3. 当今学者的观点	(40)
第二章 “景教”的由来	(53)
一、早期基督教的教派之争	(53)
二、聂斯脱利其人与聂斯脱利派基督教	(59)

2 景教与《景教碑》

三、聂派基督教的东传与独立的东方教会	(62)
第三章 从《景教碑》看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	(66)
一、景教初入中土的历史背景	(67)
1. 从《景教碑》看景教的基本教义	(67)
2. 景教初入中土的历史背景	(72)
3. 唐长安城中的第一座景寺	(76)
二、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	(79)
1. 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79)
2. “僧首罗舍”和“大德及烈”	(83)
3. 波斯寺改名大秦寺	(88)
4. “白衣景士”伊斯	(92)
三、碑文中的古叙利亚文字	(97)
1. 《景教碑》价值的另一半	(97)
2. 碑正面的叙利亚文字	(99)
3. 碑左右两侧的叙、汉双语署名	(107)
四、有关唐代景教的新资料	(111)
1. 《米继芬墓志》	(111)
2. 波斯人李素及夫人卑失氏墓志	(114)
3. 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	(120)
五、唐代景教的衰亡及其原因	(129)
第四章 元代的“也里可温”	(137)
一、景教重入中土	(137)
1. 蒙古诸部的景教背景	(138)
2. 景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	(141)

二、罗马教廷与蒙古大汗	(150)
1. 柏朗嘉宾出使蒙古	(150)
2. 鲁布鲁克出使蒙古	(154)
3. 波罗兄弟的故事	(157)
4. 蒙特·科维诺在中国传教	(163)
三、马可·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	(170)
第五章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178)
一、叩开中国国门	(179)
1. 沙勿略壮志未酬	(180)
2. 利玛窦入居广东	(184)
二、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188)
1. 从“西洋和尚”到“泰西儒士”	(188)
2. 进入北京, 进入紫禁城	(192)
3. 科学为神学开路	(199)
三、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与冲突	(203)
1. 南京教案	(204)
2. 钦天监案	(206)
3. 仪礼之争	(215)
4. 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220)
第六章 敦煌汉文景教写本的发现和研究	(230)
一、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231)
1.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	(231)
2. 斯坦因捷足先登	(239)
3. 伯希和接踵而至	(250)

4. 劫余写本运回北京	(256)
二、敦煌汉文景教写本的发现和研究	(261)
1. P. 3847 卷子	(262)
2. 李氏旧藏《志玄安乐经》和《宣元本经》	(267)
3. “富冈文书”——《一神论》	(273)
4. “高楠文书”——《序听迷诗所经》	(276)
5. “小岛文书”二种	(281)
第七章 《景教碑》移藏西安碑林经过	(287)
一、当时人对何尔谟盗碑事件的记述	(287)
1. 足立喜六的记述	(288)
2. 桑原鹭藏的记述	(292)
二、当事人何尔谟的自述	(296)
三、盗碑未遂事件的始末及《景教碑》入藏碑林	(308)
结束语	(315)
附录：《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	(321)
附图：《景教碑》拓本	(329)
参考书目	(349)

引 言



上个世纪初，1907 年，即大清国的光绪三十三年，在西北边陲“天高皇帝远”的大漠戈壁深处，在当时国人尚不甚知晓的敦煌莫高窟，曾发生过一桩今天看来最为荒谬的交易：正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以区区 200 两银子的代价，从看守洞窟的王道士手中，获取了藏经洞中大量宝藏，其中包括汉文、藏文、梵文、于阗文、粟特文等各种文本的经卷和精美的纸本、绢本画像，满满地装了 29 箱。随着斯坦因的驼队渐行渐远，这些敦煌宝藏中的精华，从此离开了中国，而敦煌藏经洞的秘密也由此不胫而走。于是，又有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等接踵而至……

也是 1907 年，与斯坦因出现在敦煌几乎同时，在曾是周、秦、汉、唐故都的古城西安，也出现了一个外国人——丹麦人何尔谟

(Fritz von Holm)，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他来西安的目的很明确：要把立于西安城西崇仁寺中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盗运出中国。这块碑在西方名噪一时，而当时国人对它的价值却不甚了了。何尔谟也买通了寺内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僧，通过他按原样将古碑复制一通，企图用复制碑换下原碑，实现其将原碑运出中国的计划。然而何尔谟却没有斯坦因那样的好运气，就在他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消息走漏，地方官府出面制止，他能运走的，只能是那件复制品。《景教碑》原碑则以此为契机，移入西安碑林，与众多唐宋古碑一起加以保护。

两起事件，发生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甚至发生在相同的时间里，能有不同的结果，真让人为《景教碑》的幸运感慨。也许是因为古都长安的文化积淀深厚，有列祖列宗在冥冥之中护佑吧。当然，也正因为结果不同，20世纪初三危山下痛失敦煌遗书的那一幕，才成了我们整个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而《景教碑》被盗未遂事件，则早已被国人淡忘了。

如今，在西安碑林的展室中，《景教碑》每天都迎接着来自祖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向后辈子孙讲述着那段曾被历史长河湮没的故事：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初年，耶稣基督的信徒们已把上帝的福音传入中土，并以“景教”的名义在这个东方古国传教二百余年。这块在地下沉睡了近八百年后又重见天日的石碑，就是当年的景教徒留给后人的物证，而且，在敦煌遗书中的汉文景教写本被发现之前，它是基督教在唐代便已入传中土的惟一物证。

自明天启五年（1625年）《景教碑》出土以来，虽然三百多年过去了，可海内外学界对此碑的关注和研究，却历久而不衰。从最早得见此碑的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到西方的教会界、学术界，无不把《景教碑》作为研究基督教传教史、教会史的珍贵史料，而在近代以来西方汉学家眼里，它则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交流、碰撞的见证。就在出土的当年，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便译出了《景教碑》碑文的拉丁文译本寄回欧洲，自此，

仅西方各国所见《景教碑》碑文不同文字的译本、注释本就有 40 种之多^①，且不论研究景教与《景教碑》的专著和论文。从 20 世纪初开始，那种《景教碑》在中国、《景教碑》的研究在国外的状况终于改变，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国内对《景教碑》的研究也取得很大成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随着新的景教遗物的发现和考定，大陆学界对景教和《景教碑》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围绕这篇不足两千字的碑文，三百多年来究竟产生过多少研究文字，恐怕已很难有确切的统计^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西安碑林数千藏石中，甚至在中国现存数以万计的古代碑刻中，《景教碑》

是国际知名度最高、被中外学者研究得最多的一块碑。由一块古碑，衍生出了一门历久不衰的国际性的学问，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例。

二

有一种说法，称《景教碑》是世界四大著名石刻之一（或者更中国化的表达：世界四大名碑之一），而与它同享此誉者，是出于埃及的《罗赛塔石碑》、出于约旦的《摩押石碑》和出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太阳历石》（或



罗赛塔石碑

① 耿昇《中外学者对大秦景教碑的研究综述》，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所编论文集《中西初识》，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67-200页。

②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一书附录《唐代景教研究论著目录》，是目前所见关于唐代景教与《景教碑》研究的最详备的论著目录，包括中文部分、日文部分和西文部分。另外，朱谦之《中国景教》一书亦附录《中国景教研究参考书要目》。



大英博物馆展室中的《罗赛塔石碑》

曰《阿兹特克授时石刻》)。大凡介绍《景教碑》的重大价值，多用此说，但却很少出现在研究著作中。笔者读书不多，一直未找到此说的最早出处。江文汉先生《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一书，言及《景教碑》是世界上“四大著名石刻之一”，他是引用那位盗碑未遂的何尔谟后来所写的《My Nestorian Adventure in China》书中的话^①。不久前，笔者得见何尔谟此书的英文新版，书中确有这样的话，而且何尔谟认为《景教碑》是世界四大名碑之首^②（后文还会专门述及此书）。从前后文看，何尔谟是在叙述他与伦敦的博物馆及学术机构讨论《景教碑》的重大历史价值，以

①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34-35页。

② Frits Holm《My Nestorian Adventure in China, A Popular Account of the Holm-Nestorian Expedition to Sian-Fu and Its Results》，Gorgias Press，2001，第151-152页。

及获取《景教碑》的办法之后，讲这番话的。很显然，它不是这位年轻记者自己的话，它反映的是当时西方学术界对《景教碑》重大历史价值的普遍认识。

《罗赛塔石碑》是 1799 年拿破仑远征军的一名叫布萨尔的军官，在埃及亚历山大城附近罗赛塔镇挖掘工事时偶然发现的。1801 年，法军战败，《罗赛塔石碑》便成了英军的战利品，被运回英国，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此碑已经残损，高 114 厘米，宽 72 厘米，用黑色玄武岩刻成，



商博良 (Jean Francois Champollion, 1700-1832) 埃及象形文字的释读者

刻于希腊人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碑文记载托勒密五世（前 205 - 前 180 年在位）登基庆典之事。这块碑的年代并不算早，埃及的碑石刻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的早王朝时代。可这块碑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用希腊文、古埃及文的圣书体和世俗体三种书体刻写的，这就为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重要线索。碑文的解读由英国的 T·扬和法国的 J·F·商博良完成。T·扬发现碑文和克里奥巴特拉女王方尖碑铭文中，王室成员的名字刻于椭圆形圈内，因此他确定“托勒密”和“克里奥巴特拉”这两个名字应该都是用音值符号写的，而这些符号很可能与碑文中希腊文人名相对应。商博良则最先意识到碑文中的象形文字是希腊文的译文，其符号有些是字母，有些是音节，有些是意符，并最终于 1822 年成功解读了碑文。《罗赛塔石碑》的解读，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对欧洲近代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其三体对照的碑文，犹如一把打开古埃及历史文化宝库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学者们好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文献档案库，可以直接阅读大量的草纸文献和碑石刻铭，埃及王朝时代的历史乃至古埃及人政治、

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下子展现到了今人面前。

《摩押石碑》是1868年德国传教士克莱茵在约旦死海东岸的迪朋（也译作底本、泽班）发现的，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此碑高110厘米，宽70厘米，厚40厘米，刻于公元前9世纪中叶，碑文记述摩押国王米沙率摩押人击退犹太人入侵的事迹。这块碑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证实了《圣经·旧约》关于摩押人和摩押王的记载是可靠的。摩押人是西闪米特人的一支，居住在约旦高原，学界把摩押文化的年代大致定在公元前14世纪末至公元前582年，这一年，摩押被巴比伦所征服。按《旧约》所记，摩押人与以色列人同源，其始祖摩押是以色列人始祖亚伯拉罕之侄罗得所生。另外，《摩押石碑》的34行铭文所用的摩押字母，在1923年发现希拉姆铭文^①之前，一直被看作世界字母文字最古老的实物。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在原始迦南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字母文字——共22个字母（无元音）的腓尼基字母，用来拼写属北闪族语言的腓尼基语。这是世界字母文字的开端。在西方，腓尼基字母派生出古希腊字母，后者又发展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而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是所有西方国家字母的基础。在东方，腓尼基字母派生出阿拉比亚字母，又由此演化出印度、阿拉伯、希伯来、波斯等民族字母。甚至中国的维吾尔文、蒙古文、满文字母，也是由此逐步演化而来。《摩押石碑》所使用的字母，正是腓尼基字母传播至巴勒斯坦地区后的最早的实例之一。明白了这一点，《摩押石碑》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便毋庸多言了。

《阿兹特克太阳历石》也称《阿兹特克授时石刻》，是1790年在墨西哥城修建城市广场时出土的，为直径3.7米的圆形巨石，重

① 所谓希拉姆铭文，是指1923年在古代比布鲁斯城址发现的腓尼基字母文字，刻于公元前11世纪国王希拉姆墓碑上，也称比布鲁斯字母。比布鲁斯是古代腓尼基的海口商埠，城址在今黎巴嫩。比布鲁斯字母早于摩押字母，是迄今所见最古老的腓尼基字母文字的实物。

达 25 吨，是阿兹特克人奉献给太阳神的纪念碑。阿兹特克文化是墨西哥古代印第安人文化最后阶段的代表，盛于 14 - 15 世纪，1520 年灭亡于西班牙人的征服。阿兹特克人继承了玛雅人的历法，通用“太阳历”和“圣年历”。前者每年 18 个月，每月 20 天，另加 5 天禁忌日，全年 365 天，每四年加闰一天；后者每年 13 个月，每月 20 天，全年 260 天，两种历法同时并用。《阿兹特克太阳历石》刻于 15 世纪，图案中央所刻者，是太阳神托纳提乌，第一层内圈 4 个或人或兽的形象，代表太阳神的 4 个前身。在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观念里，创世以来曾经历过 4 个太阳，但这 4 个太阳相继被风、土、水、火所灭，现存的是第 5 个太阳即托纳提乌。也就是说，创世至今宇宙已经历了 4 个“太阳纪”，我们正经历着的是第 5 个“太阳纪”。刻石由中央向外每一层圈子，每边都有 13 或 20 格不同的图案构成，这是与阿兹特克历法和宇宙论相关的图画文字及符号。玛雅人计数以 20 进位，所以每月 20 天；他们的纪年方法，52 年循环一次，类似于古代中国人的干支纪年。玛雅人的



阿兹特克太阳历石 发现于 1790 年，直径 360 厘米，重 24 吨。

历法，公元前即前古典期之末便已创立，其精确度超过了同时期希腊罗马的历法。只要想一想，他们所测算的地球年是 365.2420 天，而现代人所测算的是 365.2422 天，误差仅 0.0002 天，便可知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天文历法及数学知识有着多么高超的水平。而这块太阳历刻石所表现的，正是阿兹特克人的天文历法、宇宙观和世界观，是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

可以说，以上与《景教碑》同享“世界四大名碑”之誉的三种著名石刻，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清楚了这一点，就可以对《景教碑》的价值和地位做出正确的定位，就能够理解，何以三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西方学者、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对《景教碑》的



阿兹特克太阳历石的复原图

研究倾注了那么多的精力和心血。至于所谓“世界四大名碑”这样的说法，原本就不是严格的科学概念，自 19 世纪末以来，新的考古发现何其多也，如果有人提出新版本的“世界四大名碑”，甚至“八大”、“十大”，都是可能的。这其实并不重要，只要知道曾与《景教碑》比肩的石刻，都有怎样的价值和地位，就足够了。

三

呈给读者的这本小书，并非纯学术的研究著作。虽然迄今为止，对《景教碑》的研究仍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尤其是与碑文内容相关的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依然有待进一步深入。然而这些方面的研究，非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不可，不但要了解国内的研究现状，还要与国外的同行保持联系，不断交流。这块碑毕竟已被研究了三百多年，面对国外、国内诸多前贤、今贤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作为一般的研究者，要想在他们的基础上前进哪怕半步，也已经很困难了。笔者只是博物馆的普通研究人员，当然算不得大学问家，勉强算得上一般的研究者，即便有研究《景教碑》之心，也无相应之学力和相应之条件，只能是知难而退，未敢贸然置喙。

然而,《景教碑》是收藏在西安碑林的,每天都有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文化背景的参观者驻足于碑前,对于那些不满足于讲解员一般性的解说,希望对《景教碑》有进一步了解的参观者,作为收藏单位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一本知识含量相对较高的综述性的普及读物。十多年前,笔者就有心写一本这样的书,可当时接触的资料尚少,自信不足,没有动笔,但一直关注国内学界对《景教碑》的研究,注意搜集资料。两年前,考虑到退休在即,想了却这一心愿,遂于2006年下半年开始,动笔撰写这本书,迄今二易其稿,总算是写完了。作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本人虽不敢奢望在《景教碑》的研究上有多大建树,但是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用尽量通俗易懂的文字,把《景教碑》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史实,比较系统地介绍给参观者和读者,却是自己的责任,也是通过努力能够做到的。

博物馆是社会公益事业,博物馆的藏品是整个社会的财富。按笔者的理解,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其基本对象是馆藏文物,其宗旨则可用“服务”二字概括。首先,是为学术研究机构如高等学府、科研院所,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服务,毫无保留地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实物资料,并在对藏品进行科学鉴定、断代、定名及揭示其历史、艺术价值的基础上,将藏品的基本信息以图录和资料汇编等形式公诸于世。另外,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社会教育,其研究工作的更广大的服务对象是观众。不仅通过陈列展览和讲解(直接体现其研究水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还应通过宣传画册和普及读物进一步满足观众的求知欲;不仅要有较低层次的大众化的出版物,还应有能够反映当前学术界对某件或某类馆藏最新研究成果的较高层次的知识性读物。这本《景教与景教碑》的定位便是后者,是笔者写给那些文化层次比较高的观众和读者的。一般情况下,在学术前沿的学者们对景教和《景教碑》的研究成果,或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或结集为艰深的学术专著,一般人不易读到,也不易读懂,而我想要做的,就是把产生于研究机构、高等学府这类“象牙塔”中的研究成果,介

绍给有求知欲望的参观者和读者，在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当然，在介绍的过程中，在对某些尚无定论、存在争议的问题的表述中，笔者也顺便说明了自己的观点。而有些章节，比如第七章“《景教碑》入藏碑林的经过”，则是自己研究的收获^①。搞清如《景教碑》这样重要的馆藏文物的流迁经过，是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本分。

虽说本书不是纯学术的研究专著，但笔者在撰写过程中，从内容和形式上，力图保持它的学术品格，并在此前提下，追求它的知识性和可读性。本书的内容围绕《景教碑》这件珍贵的石刻文物展开，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文物本身，而是以碑为出发点说开去，凡与景教有关，与基督教在古代中国传播有关者，均有涉及。也就是说，从唐代的景教开始，一步一步再现基督教入传中土的足迹。由于涉及的面稍宽，便有详略之别，与《景教碑》关系密切者，尽量详之；关系稍远者，则简略述之，点到为止。当然，这也与笔者自身的知识面有关。比如述及“景教”的由来，就要涉及基督教的源起和早期基督教的教派之争，而基督教史是世界性的大学问，像我这样仅知之皮毛，哪里敢多嘴？再比如，关于元代的“也里可温”，关于明末清初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关于敦煌遗书，本身就是大学问，且是热门学问，一个世纪以来几代学者为之倾注心血，而笔者能够做的，只是依据所读到的前人和今人的研究著作，用尽量通俗的语言加以表述。即便是与《景教碑》及唐代景教密切相关的内容，也每每不敢自信，因为应该读的书和文章太多，而自己信息闭塞，孤陋寡闻，生怕该读的还没有读到，该说的还没有说到，而说到的又可能说错。

尽管早已过了当学生的年龄，可当我把书稿改定准备交给出版社时，仍像一个答完考卷的学生一样忐忑不安。我只知道，西安碑林需要这样一本关于《景教碑》的书，可我不知道自己交出的答卷是不是及格，不知道这本想要成为“桥梁”的书，能否被专家们认可，能否被观众和读者们接受。

① 笔者10年前曾写过一篇小文《景教碑移藏西安碑林经过》，刊于《文博》1997年5期。这次则据所获新资料加以改写和补充，作为本书的第七章。